

前言

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，依序分爲〈習近平執政與共黨體制權力收放循環模式〉、〈從合作到整合：歐盟對俄烏衝突的差異化運作（2014-2025年）〉及〈從封鎖到隔離：以歷史制度主義解釋共軍犯臺思路的轉折〉。

〈習近平執政與共黨體制權力收放循環模式〉一文討論爲何習近平會回到毛左的集權路線？爲何習主政下的中國，在外交上呈現出對西方抗衡，在經濟上則重新擁抱社會主義與強化國有制的政策？作者對比當前的中國共產黨與蘇聯，發現如同布里茲涅夫，習近平也幾乎都取消前朝的改革，導致經濟發展的遲鈍及對外關係的緊張。布里茲涅夫時期的「停滯時代」，似乎也出現在現今中國。而習近平的人格特質對這個現象可提供部分解釋，但更不應忽略政治與歷史的結構因素，共黨體制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主義的不相容，使得共黨政權與西方國家之間，難以有效的融合，而習近平在2012年之後的執政，可能是第三次收放循環過程中的「收權」階段。然而，對比歷經布里茲涅夫停滯時期後的蘇聯，戈巴契夫提出「新思維」的路線並改變了一黨專政的體制，後習時期的中國，是否會出現類似像是戈巴契夫的人物？是否中國會走向第四階段來重新擁抱改革與外交低盪政策？這仍需要進一步的討論。

〈從合作到整合：歐盟對俄烏衝突的差異化運作（2014-2025年）〉一文則討論歐盟從2014年以來對於俄烏衝突的應對——從「自主性」、「行爲規範」和「運作邏輯」三個指標，界定「差異化合作」與「差異化整合」概念，進而探討歐盟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及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，其自身、對俄制裁及對烏支援的轉變。「差異化」自歐洲統合早期即存在，並在《馬斯垂克條約》建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後成爲常態。差異化的發展雖是功能制約與政治

壓力妥協的結果，在主權考量、解決利益和偏好分歧及其所導致的決策僵局、國際局勢變化等因素交互作用下，歐盟機構及其成員國產生了靈活參與、因地制宜的差異化運作形式。烏克蘭危機則凸顯了歐盟在安全議題上的制度化不足，利益分歧使政策陷入僵局，高峰會和理事會掌控議程制定權，執委會與高級代表轉變為成員國的執行部門。然而，危機也是轉機，當威脅再度出現時，成員國感受到進一步整合的壓力，因此尋求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：歐盟對 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，比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時更加快速、範圍更廣，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與一致性。

〈從封鎖到隔離：以歷史制度主義解釋共軍犯臺思路的轉折〉一文則是討論中國為何更可能對臺「強制隔離」，以及共軍犯臺思路的變化，作者認為中國為避免因對臺動武重挫經濟發展、需要增加極限施壓策略選項，以及必須規避無法確定美國會否協防臺灣的「戰略模糊」風險、必須消除國際社會干預臺海衝突的理由等因素，使得「強制隔離」成為中國在對臺動武前，迫使臺灣接受北京政治條件的最佳選項。傳統上，共軍對臺動武思維主張的區域封鎖、三棲進犯路徑，正是共軍在軍力提升，以及防範外軍介入的考量下，所產生的自我強化、報酬遞增、效用堆疊與深化制度慣性等同時作用的結果；然而，中國為避免因對臺動武重挫經濟發展及避免美國介入的風險，強制隔離成為更合理的選項，也就是「未達封鎖的國際法要求，但又具備相近效果的隔離」，例如關閉港口等「特別執法行動」與灰色地帶行動。

《遠景基金會季刊》編輯部